

绪 言

（一）

中国方志学源远流长，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章学诚的方志学体系和民国时期的一些方志学专著，对方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那毕竟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一类，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倡导的方志学，应该而且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是当代方志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如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一样，是一个学科的总体概念，而不是仅指一部专著的书名，一篇专论的题名。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是由众多的方志理论专著和专论体现的，每一种专著或专论都是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一种实践。当然，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专著和专论是其主干和支柱，因为它们是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实践成果。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根本含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志文化的产生、衍变及其发展规律，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多少关

于地方志的具体论述。这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方志学基本属于同一概念，因为这里所说的“新”主要也是“新”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至于诸多具体内容当然无须生硬地套用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些词语和结论，这是不言而喻的。

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已具有充分的客观条件。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萌发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后因“社会主义教育（又称“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中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又兴起，至今已有十七八年，若从大规模开始编纂活动的 1980 年算起，也有 16 年的历史，取得了周期性的实践经验。至 1995 年 6 月底，共出版省、市、县 3 级志书 2183 种，加上已经定稿正准备出版的，约 3400 余种，占计划数 6000 种的 57%。从组织班子，到编纂实施；从出版发行，到读志用志，都有了切实的体验。这种丰富的实践是理论研究的巨大动力和宝贵财富。同时，到 1996 年止，10 万修志大军中，专职修志人员达 22000 余人，兼职达 91000 余人，共计 110000 余人。专职人员中有不少各种专业（其中包括方志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获得正高职称的已有 200 余人，副高职称的 1800 余人，中级职称的 7000 余人，人员素质大大提高，并向专业化迈进。他们在编纂大批志书的同时，撰写出 1 万篇以上的论文，300 部以上的专著和论文集，进行了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初步实践，打下了相当厚实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一些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编著出 10 多部概论性专著，诸如刘光禄的《中国方志学概要》来新夏的《方志学概论》薛虹的《中国方志学概论》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林衍经的《方志

学综论》胡惠秋、刘光禄的《方志学引论》张革非的《中国方志学纲要》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黄苇的《方志学》罗来兴、李宝田、关成和的《中国城市方志学概论》等等，更是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蓝图和借鉴。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成为方志理论研究的强大思想武器，鼓舞我们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实现“传统方志学”到“当代方志学”的深刻变革。所以我们说，丰富的实践经验，厚实的理论基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客观条件。

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是我们当仁不让的责任。邓小平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视察上海时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说，毫无疑问需要这种勇气。对于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来说，也同样需要这种勇气。一次伟大的修志实践，应该伴随一次伟大的方志理论飞跃，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也许要两代人、三代人的奋斗，但10万修志大军理应当仁不让！所谓当仁不让，就是要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勇敢地把担子挑起来。要立足成功，准备失败，即使彻底失败了也可以为别人和后人提供宝贵的经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江西省地方志学会于1995年3月组织编写班子，着手《当代方志学概论》一书的编写工作。我们作为《当代方志学概论》的编写人员，愿意得到志界同仁的无私帮助，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推动方志理论建设向纵深发展，为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添砖加瓦！

(二)

我们把《当代方志学概论》的编写当作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一种实践。因为这是新方志理论研究发展的必然。与新志编纂相呼应，新方志理论研究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至今大体经历过 4 个阶段即 1949 年底至 1979 年的酝酿准备阶段。这个阶段修志实践不多，成果也不丰富，理论研究只是个别的、零碎的，但却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修志工作中和理论研究中的指导地位；1980~1985 年的批判继承传统、传播基础知识阶段；1986~1993 年的从事编纂研究、解决实际问题阶段；1994 年起的进行理论升华、构建学科体系阶段。为什么以 1994 年作为第四阶段的起点呢？我们认为有 2 个“标志”那就是 2 个“座谈会”：1994 年 7 月 6~10 日全国地方志工作座谈会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应当强调方志理论研究的重要”，（《全国地方志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国地方志》1994. 4）以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 1994 年 10 月 19 日~11 月 3 日在重庆市举行的方志理论工作座谈会，提出“按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组稿，系统编著带权威性的、具有一定深度和高度的、能体现这一代修志理论水平的方志学专著及其系列产品”的宏大目标。（《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召开方志理论工作座谈会》，《中国地方志》1995. 2）这 2 个“座谈会”拉开了构建学科体系的序幕。1995 年 8 月 15~17 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纪要》中更是明确指出：“应当按照现代科学的要求，在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总结当代修志经验，吸取传统方志理论精华，引进相关学科理论，努力把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新方志学建立起来。”（《中国地方志》1995.4）到1996年5月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的召开，更是把新方志学学科建设提到了重要位置。1996年5月4～7日《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在“提高专业队伍素质，加强方志学科建设”专项中谈到：“必须大力加强方志基本理论和方志编纂学研究，建立新方志学科”。“要着手制定以建设新方志学为目标的方志理论建设规划。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建设起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方志学，为下一世纪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中国地方志》1996.3～4）这就进一步吹响了构建学科体系的冲锋号角。

客观条件的具备，使方志学科建设成为可能；方志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使方志学科建设成为必要。因此，构建学科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也就势在必行。

（三）

《当代方志学概论》作为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一种实践，着力于寻求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方志学的结合部。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努力吸取传统方志学的精华；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立足于新志编纂丰富而又深刻的实践；坚持推陈出新的方针，勇于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当代方志学概论》的主要任

务是 2 个：一个是认真总结新志编纂的丰富经验，另一个是积极反映方志理论研究的新鲜成果。努力使自己成为理论信息量大、科学实践性强的著作之一。

《当代方志学概论》的特点虽然是立足当代，但仍然以方志学的所有研究对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我们认为方志学是研究方志文化的产生、衍变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方志文化包括 2 个主要内容：一是方志，二是由方志波及而形成的社会文化事项。具体地说，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有如下 6 个方面：

1、方志起源、方志性质、方志功能、方志品类、方志编纂等；

2、方志应用、方志评论、方志整理、方志事业、方志事业管理等；

3、方志与政治、方志与经济、方志与文化、方志与当政者、方志与人民群众等；

4、方志学学科属性、学科地位、学科体系等；

5、方志学与相关学科等；

6、方志史、方志理论研究史、方志学史等。

这其中的第一类与第四类是方志和方志学本身所具有的，第二类与第六类是与方志和方志学直接发生联系的；第三类与第五类则是与方志和方志学间接发生联系的。如果这些内容都能得到严谨的、系统的、科学的理性阐述，我们这一代人在取得志书编纂丰收的同时，也取得理论研究丰收的目的就算基本达到了。

《当代方志学概论》的总体构架是：在学习、继承前人和别

人诸多深刻学术见解的基础上，大胆阐述自己的心得体会；将学科地位、学科体系视为本书的支柱，将新志编纂作为本书的重点；然后再论及其他相关问题。志书出版问世后，应该充分发挥其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要更好地显示志书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现实效益与长期效益，很大程度上需要方志批评的宣传与指导；同时也需要方志整理的综合与分析，全国性方志目录、方志提要的编辑是整理中的综合，大量的资料类编、专题研究是整理中的分析，资料类编和专题研究是将大部头的志书转化成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轻骑兵”的有效形式。而所有这一切都应通过科学的管理来达到目的。这就是我们对本书各章内在联系的一种认识和理解。各章的具体阐述，一般都先介绍前人和别人的主要观点，同时阐发自己的认识，再表明自己的看法；这样做的意图在于既增加理论信息量，又说明我们的看法与前人和别人观点的关系，或是大同小异，或是另有见解。

鉴于《当代方志学概论》主要是立足当代，因此，对方志史、方志学史涉及不多，但却用较多笔墨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志编纂史、理论研究史和新志整体面貌与水平，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正是“当代”²字的内涵所在。

第一章 方志学源流

第一节 散见在清以前的方志论说

方志学理论的萌芽和发展与各个时期的修志实践密切相关，并随着修志事业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

方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体系到清代才由章学诚初步确立起来。但是，清以前的不少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方志编纂的需要，或对以往方志有所评议，或对自己主修的志书有所构想，发而为之论说，虽属片断，但都为后世方志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如今我们从历代志书的序、跋、凡例，以及史书和其他典籍中，常可见到这些闪光的论点，其所涉及的理论范围比较广泛，概括起来，有关于方志渊源、性质、功用、体例、章法、人才的探讨等六个方面。

一、溯其渊源

方志卷帙浩繁，它是如何发展演化而来，其渊源如何，向为方志学者所探寻。清代以前的学者对此看法不一，各言其是，概括起来，大致有二：

（一）方志起源于历史，由先秦时代史官的记录发展而来。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是东汉人郑玄，他在《周官》注中，将外史所掌“四方之志”释为“若鲁之《春秋》 晋之《乘》 楚之《梲

杙》”那样的地方史书。宋代司马光从宋敏求纂修《河南志》和《长安志》出发，上溯到唐韦述撰《两京志》，然后将其源头追至西周史官职方、诵训，认为方志源头就在于此。他在《河南志·序》中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昭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李宗谔在《祥符州县图经·序》中也认为“地志起于史官。”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讲：“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马光祖在《景定建康志·序》中也称：“郡有志，即成周职方氏所掌。”元代黄潘在《东郡志·序》中说：“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领二县，而治白马，白马故东郡地也。分暇日阅前史及传记，得东郡事，参以旧闻，作《东郡志》十有六卷……潘窃惟……是以成周之制，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而道地图以昭王者，有土训之官焉。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昭王者，有诵训之官焉。”明代龚用卿在《重刊辽东志书·序》中说得更明确：“志，记也。记其事以为鉴，史之流也。天下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他所说的“国”，就是指古代的诸侯邦国，所谓的“史”就是指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杙》。

（二）起源于地理。我国最早的总结前人积累起来的地理知识、记载全国地理情况的重要著述是《山海经》和《禹贡》。

《山海经》记载古代巴、蜀和楚国及其以外许多地区的 40 个邦国、550 座山、300 余条水道以及这些邦国中的地理状况和风俗、民情、物产、祭祀、巫医、神祇、怪异等，还叙述了 100 多个历史人物的世系和活动。《禹贡》假托夏禹治水以后，将全国分为 9 州，作为区划，并在这一基础上，将州所在地区的山岭、河

流、藪泽、土壤、物产、田等、贡赋、交通以及少数民族居住地等作了专篇记叙。因此，《山海经》和《禹贡》历来为修志学者所重视，有的并把它奉为方志渊源之所在。《隋书·经籍志》记载：“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唐代贾耽在进《海内华夷图》表中，自称：“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明确地将源头首列《禹贡》。宋代黄裳请昭‘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后来书成《绍圣九域志补遗》，当是以《山海经》为主要源本的。元代张铉在探索方志渊源时，亦把《禹贡》列为首位，他在《金陵新志·修志本末》中说：“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图志兼记言记事之体，自山川、物产、民俗、政教、沿革、废置、是非善恶、灾祥祸福，无不当载。”明代田硕在《延平志·序》中说：“《禹贡》志所由昉。”

二、究其性质

古代学者对于方志性质问题，历来认识不一。其主张和他们对于方志源渊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亦分为 2 种：

（一）认为方志是历史书。汉代郑玄就认为方志属于“国史”。宋代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元代杨敬德在《赤城元统志·序》中说：“郡乘古侯国之史”。杨维桢在《至正昆山志·序》中说：“金匱之编，一国之史；图经一郡之史也”。这种方志是史的观点，更为明代方志学者普遍接受和论证，大量反映在其编纂的方志序跋、凡例之中，

如《皇明天长县志·后序》“夫志一方之史也。”《万历河东运司志·序》“夫志，史乘之流也，古昔家有乘，国有史，今郡邑亦各有志。”《武定州志·序》“志也者，邑之史也。”《九江府志·序》“夫志史之翼也。”许多私家目录也将方志从地理类中分离出来，成为史部独立的一类。如朱睦㮮编《万卷堂艺文记》史部有 13 类，其 11 为“方州之志”，录方志近 200 种，是为方志独立存目之始。随后又有祁承㮮的《淡生堂藏书谱》、汪宪的《振绮堂书目》等，也都如此分类。

(二) 认为方志是地理书。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九州土域，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一方。若弘盛之《荆州记》、常璩之《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也。”颜师古也说：“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纂述方志。”宋代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序言中说：“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县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志，舆地有记。”元代黄潜《东郡志·序》中也说：“昔之言地理者，有图有志。”历代公私书目，也多把方志归为地理类，亦是这种观点的反映。如《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以及梁阮绪《七录》、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郑樵《通志·艺文略》、明焦竑《国史·经籍志》等，都是将方志归为地理类的。

除上述 2 种说法外，还有一些学者主张方志为政书。如明代林魁认为“志者，言治之书也，夫纪垂成远为治计也。”（《龙溪县志·序》）雍澜也认为“志也者，经治之书也，匪司政者有经治之材，而载笔者有经治之识不足以与于斯”。（《平和县志·序》）。

三、论其功用

早在古老的《周官》一书中便已述及当时图、志的功用，如“职方代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土训掌道地图，以昭地事。”秦、汉至隋唐，论述方志功用者代不乏人。唐刘知几作《史通》，对当时的郡书、地理书、都邑簿 3 种地方文献的功用，分别作了分析。他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地理书“九州土宇、方国山川、物产殊异、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都邑簿，“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史之制，不恒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他认为方志有褒扬一方人物，辨明一方风土及龟镜将来之功用。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公然声称，修志就是为了“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后，大规模的修志实践提高了人们对方志功用的认识，纂修《景定建康志》的马光祖、周应合鲜明地提出“补世说”，认为“天时，验于岁月灾祥之书；地利，明于形势险要之设；人文，著于衣冠礼乐、风俗之藏否；忠孝节义，表人才也；版籍耗登，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道，垂劝鉴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先后主修《合肥志》、《广陵志》的郑兴裔概括方志有 3 大功能，①存史功能。认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身虽不下堂阶”，而一地大概皆“恍然在目”。资政功能。认为一地有志书，则“郡之中

所为山川之广袤，守得而考之，户口之登耗，守得而询之，田畴之荒治，省得而省之，财富之赢缩，守得而核之，吏治之臧否，守得而察之，风气之贞淫，守得而辨之。守之奉命而来此也，所以上报天下，下顺民情者綦重矣。夫事不师古宜今，而欲有为，譬之闭门造车，未见其合，志曷可废乎？”^③教化功能。认为方志载当地“嵩岳降灵，勋名成于仕宦，山川毓秀，贤声著于乡邦，千秋之俎豆增光焉。若夫遇名山而歌咏，掷地金声，历馆阁而抒辞，光天藻彩，邹、枚、鲍、庾之徒，赫赫在人耳目也。他如邽股砥纯孝之行，断指凜冰霜之节，可以立懦廉顽，风兹百世，旌庐表墓。”后世学者亦多从存史、资政、教化这 3 个方面论证和阐述方志的功用。元代黄溍认为方志有“图以知山川形势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凡皆达于朝廷，而关于政令，不特以资学士大夫泛览而已”。他还指出方志有教化、存史功用，“文献有足征者，宜其为书纂辑也备，考据也精，所记人才消长，风俗盛衰，上可以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文华事实之故，下可以俟采录而垂之无穷，岂托于空言以为著述者，可同日而语哉！”明代李登在万历《上元县志·后序》中说：“志有三要焉，一曰经政，二曰观风，三曰考艺。”周瑛在弘治《兴化府志·序》中指出方志的功用为“修正立事，济人利物，移风易俗。”

四、谋其体例

古代方志学者十分强调方志体例的重要，重视“发凡起例”。唐代刘知几认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 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宋代郑樵在《校雠略》中也说：

“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马光祖、周应合在《景定建康志·修志本末》中说，修志过程必须做好4件事，将“定凡例”列为首要，用以确定志书的体例结构、编纂方法及门类设置。随着修志实践的发展，历代学者对于方志体例的探讨和追求，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沿着继承和发展的道路而体例愈臻严密。志书体例的理论探讨大多由志书的凡例、志目予以体现。宋明以来，志书普遍有凡例，对于把握体裁，以志为主，横排门类，纵贯时间，结构完整，篇目有序，时空界限，详略范围，行文规则等，皆有规定，成为确保志书体例统一的法则。然并不陈陈相因于前志，而不断有所创新，如陈洪谟纂《嘉靖常德府志》在体例上打破旧志平列分目的惯例，采取设志、目2级的方法，志下设目，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并且打破旧志的“天章冠首”不在卷首列“皇言”、“诏谕”之类的文章；一反当时“首重天文”以“星野”排头的作法，开宗明义以“沿革”作为篇首，纵述常德古今地域及其变化。作者说，府志“首中以地理，继之以建设；有人必有养，继之以食货；有养而后教立，继之以学校；教立则礼可兴，继之以祠祀；治民事神，有司是任，继之以官守；文事武备相须，继之以兵防；地以人胜，虽所产不同，皆山川所钟，继之以人品。”从理论上论述这种安排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内在逻辑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古代方志志体程式精彩纷呈：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编年体、三宝体、政书体、两部体、三书体等，各有所长，各有特色。这些志体的形成，无不源于方志学者对于方志理论的探讨和追求，每一种体式都代表和反映了一家之说。如明代陈棊

《嘉靖广平府志》首创两部体，以经纬分体，上下两大部类，经类包括封域志、郡邑志、山川志、建置志、学校志、书籍志、坛宇志、古迹志；纬集有官秩志、选举志、宦业志、贤行志、列淑志、恩泽志、经历志、风俗志，间以图、表。陈槩在序中表述了此种设计的理论依据，所谓经者，“自封域以至古迹，皆形质疑定之目，所列者在物，乃主也，静也。”所谓纬者，“自官秩以至风俗，皆运动推动之号，所取者在事，乃宾也，动也”。又云：“经纬者，两仪之象也；一图者，太极之体也；三表者，效三才也；十二纪者，十二时也。对待有相配之体，禅继有相生之序。”此体虽不久传，终不失为一家之说。

五、规其章法

关于方志的章法，即撰写的一般要求，向为古代方志学者所重视。在论述中首重“求实”，这不仅散见在方志的序跋中，而且集中于对旧志的评论和批评中。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后贤志序中说：“善志者述而不作，序事者实而不华。”唐代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注中说：“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为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说：“尚古远者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元代许汝霖在《崑志》自序中批评宋代高似孙所撰《剡录》：“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纪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于清放之流。版图所以观政理，而仅举其略；话所以资清谈，乃屡书不厌；他如草木禽鱼之诂，道观僧庐之

疏，率皆附以浮辞而过其实。”反映了他选材宜精，详略要当，反对虚妄怪诞，厉行朴实质直的修志主张。康海在《朝邑县志·序》中也说：“志者，记也。记其风土文献之事，与官乎斯土者，可以备积其改革，省见其疾苦，累行其已行，察识其政治，使天下为士大夫者读之足以兴，为郡邑者读之足以劝，非以夸灵性之迹，崇奖饰之细也。”说明方志记之不实，难以发挥其资政、教化之功用。明代《嘉靖曲沃县志》主修者刘鲁生提出志书的书写标准应是“其载欲细，其事欲核，其书欲直。”就是说：记载要尽其所有，无所不包；事实要仔细核对，翔实确凿；对是非非要敢于秉笔直书。他还提出志书的编纂原则是：“必广询博采，而后无遗迹；循名责实，而无讹传；义正辞严，而无赘语；类序伦分，而后无乱章。”

六、议其人才

名志出自名家。古代方志学者对于方志编纂的人选多所论重。宋代《新安志》的作者、进士出身的罗愿说：“夫所记山川道里者，非以言广也，务知险易不妄戒也；其录丁口顷亩，非以览富厚矣，务察息耗繇夺也；其书赋贡物产，非以给嗜欲也，务载阔狭同民利也；至于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风俗之恶美，与其人材之众寡，是皆有微旨，必使涉于学者纂之。……若直抄取计簿以为书，则凡吏之善书者，足以次之矣，其施于事亦然。若直据令甲以为治，则凡吏之母害者足以听之，盖世常以为此无事乎儒，而儒亦卒不可废于世也，岂特此哉。”他反对把方志简单地变成资料汇抄，主张志书为著述之书，编纂者必须学问渊博，用自己的观点对资料进行选择、考证，则必须得其人而为

之。宋周波在《清波杂志》中说：“近时州县皆修图志，志之详略系夫编摩者用力之精粗”，也强调“志在人为”的道理。明代黄仲昭编纂《八闽通志》，说：“我的力不能胜衣，而心欲负九鼎，我的官不逾九品，而视金、张（金日磾、张世安，皆为汉朝高官贵族）为无物，我的学术未究乎一经，而妄意颜、孟为师。”意在编一部好的志书非有远大志向和刻苦的治学精神是不可能办到的。他死后，有人给他作墓志铭，写了这样 2 句话：“腹则百氏，志则千古”。赞扬他在《八闽通志》编纂中取得的成就。

这些经验之谈、心得之论、学术之见，为清代方志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第二节 清代方志学的建立

一、清初学者对方志学理论的研究

清朝是我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兴盛时期，自顺治起，即仿效前朝功令下诏修志，康熙、雍正先后开馆编修《明史》和《清一统志》，命督抚各修省志，府州县亦修志，以备采择。雍正还颁发了各省府州县要 60 年一修志书的法令。由于统治者积极倡导，编修志书风气盛行，不少著名学者也积极参与，由于他们具有相当的学识，对于如何编修志书均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在实践中又多所体会，并注意总结经验，大大推动了方志理论的发展，促使方志学科体系的形成。在这些学者中，对于方志理论论述颇丰、建树较著者有顾炎武、卫周祚、张沐、宫梦仁、储大文以及方苞、李绂等。